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提出的一项计划,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1934年正式出现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此后“河豚鱼计划”的内容更加详细完善,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那么,日本缘何如此青睐犹太人,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历史秘密呢?

觊觎犹太人的财富, 是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 的原动力之一

在世界各地的排犹运动中,沙皇俄国也出现了一批激进的反犹主义者。190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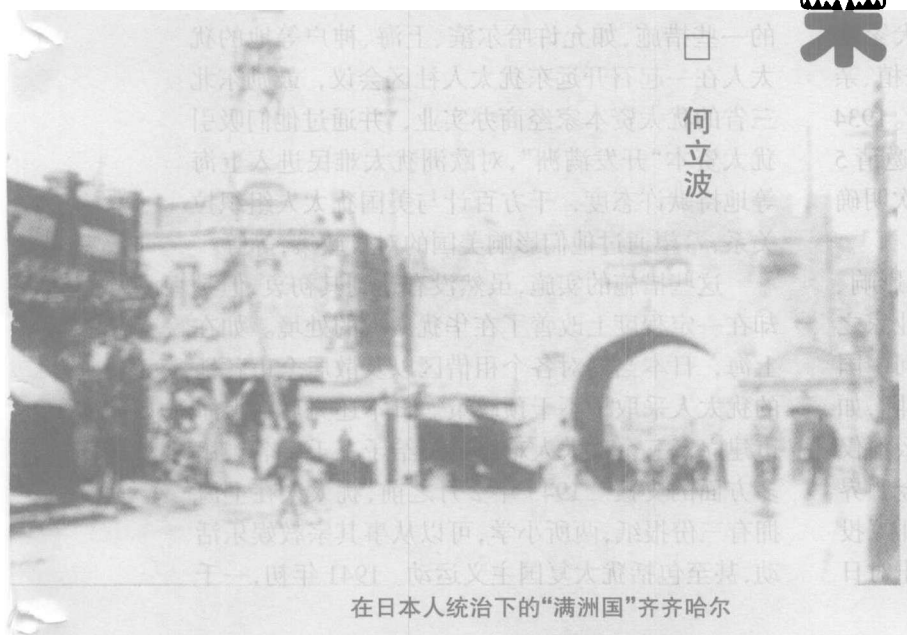
日本推行「河豚鱼计划」始末

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致残86人,轻伤500人,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损失约数百万美元。这件事给犹太人留下很深的记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歌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站在了日本的一方。他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帮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颂扬雅可布·歌夫,历史书上作为一章来叙述他。日本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邀请歌夫共进午餐。在日本国内,有一批亲犹人士,对世界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十分迷信。

日本“河豚鱼计划”最初的实施地点,就是日本统治下的所谓“满洲国”。日本人选中国东北,和哈尔滨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尔滨曾是近代犹太人在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894年第一位犹太人定居哈尔滨到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迁居至此,最多时达2.5万人。他们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强占了中国东北。在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犹太人受到排挤,犹太商社日益减少。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特别是中东铁路转卖给日本后,使一些为铁路员工服务的犹太零售商失业,许多犹太商店倒闭。自1932年至1936年间,犹太商店倒闭25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国”齐齐哈尔

何立波

户。在日本势力支持下,哈尔滨的一些白俄组织,进行疯狂的反犹活动,绑架犹太富商,打碎犹太教堂玻璃,进行反犹宣传,致使大批犹太人陆续离开哈尔滨,前往天津、上海等地定居。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就哈尔滨等地犹太人遭迫害一事,向日本外务省次官重光葵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虽然开始时日本人对哈尔滨犹太人采取了打击政策,但是中国人民对犹太人非常友好。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评述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时激动地说:“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叠,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 日本开始拉拢哈尔滨犹太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它们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

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日本的一些所谓的“犹太问题专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小迁等人,纷纷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满洲国”的统治。1934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首次明确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

在这些“专家”中,鲇川义介是一位颇具影响、地位较高的人。他是二战前日本的主要企业家之一、钢铁巨子,和犹太人有过交往。他在访问中国东北之后,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

本侵略的攻击。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需要改变对哈尔滨犹太人的政策,于是日本人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上层人物交朋友。“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到哈尔滨访问,与犹太人领袖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1937年12月,犹太人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哈尔滨、上海、日本神户等地。安江仙弘和在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职的樋口喜一郎将军参加此会。樋口喜一郎在会上说:“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这次大会上,犹太人通过了一项送给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自有其如意算盘。其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其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同时,日本政界要人认为,在侵华战争中,可以利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产,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日本政府采纳了犹太问题专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如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在一起召开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开发满洲”,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没有达到其初衷,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华犹太人的处境。如在上海,日本当局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了不干预政策。日本还先后在上海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可以从事其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年初,一千

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以后,又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把这批难民移送上海。

“五相会议”之后,日本政府 开始打犹太牌为其战争服务

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参加会议的有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着分歧,但是都基本认可了犹太问题专家的构想。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鱼计划”更加翔实。

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的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其实,“河豚鱼计划”中的其他内容,也多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中没能实施。

“五相会议”召开后数星期,在日本方面的操纵下,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喜一郎和安江仙弘在会上提出同样的要求,希望和犹太人合作。为了拉拢考夫曼医生,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他到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他在回哈尔滨之前还被授予“帝国勋章”。

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些犹太人没有住处,没有工作,需要早先来上海的犹太人的援助。而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来

上海创业的中东犹太人(赛法迪姆人)和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则开始抱怨这些后来者为他们生存许久的城市带来困难。他们组成代表团正式向犬冢惟重提出:日本能否劝说德国和意大利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或者日本自己能否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我们已经承担的太多了!让其余的人到其他地方去吧!让其他的人去养活他们吧!”

这个要求使大力鼓励欧洲犹太人来华的犬冢惟重等“犹太问题专家”感到很尴尬。尽管如此,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日本人决定安抚这些要求遏制难民流入的犹太人。1939年8月9日,犬冢惟重宣布了限制犹太人从欧洲或“满洲国”移民来上海的措施:从这以后,来上海的难民需要交400美元的保证金并持有任职合同。犬冢惟重反复声明:“采取这一措施是应犹太难民委员会自己的请求。”

上海犹太人社区对欧洲难民的态度,使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很沮丧,于是,他们又把注意力转向美国犹太人社区。

美国犹太人魏斯并未上日本人的当, 致使“河豚鱼计划”难以实施

在美国犹太人社区,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魏斯。他与美国两任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关系都非常密切,对于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犬冢惟重曾说过:“总统走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就像影子随着躯体。”魏斯是位思想进步的犹太人,他对日本侵略者没有好感,在书信、文章及讲道中,大力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1938年,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留·齐克曼写信给斯蒂芬·魏斯,在信中说了句:“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在回信中严厉批评了留·齐克曼:“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1939 年 12 月下旬,在日本方面的策划下,哈尔滨召开了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会议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我们也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难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入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则我们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即日本如果提供某地),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个新亚洲而合作。”第三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将上述决议寄给魏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魏斯没有给予回复。

为了实现“河豚鱼计划”,魏斯的态度举足轻重,倘若他不点头,美国犹太人社团是不会给这一计划提供资金的。而且,日本人还希望通过魏斯影响罗斯福总统,所以对魏斯百般拉拢。1940 年初,日本派出与魏斯有过交往的实业家田村光三作为

代表,前往美国会晤魏斯。

田村光三与魏斯见面后,便喋喋不休地大肆宣扬日本人民对于犹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关系,并提出了让欧洲犹太移民到“满洲国”的“河豚鱼计划”,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援助。魏斯拒绝了田村光三的建议。当田村光三告辞,走出房间后,魏斯对自己的助手大声说:“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仍不死心,犬冢惟重又鼓动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犹太人爱里斯·哈伊姆给魏斯写信,希望魏斯派代表团到上海来,也遭到了魏斯的冷遇。没有魏斯的支持,“河豚鱼计划”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河豚鱼计划”的最终流产

魏斯的对日态度,让日本当局恼羞成怒,统治集团中的反犹势力趁机鼓噪起来。1940 年 7 月,

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9 月,三国公约签字。日本政府为了取得希特勒的信任,对犹政策必须发生根本改变。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 年 1 月,日本政府最终放弃了“河豚鱼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再给驻汪伪政权的“大使”的信中说:“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

1942 年 6 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抵达上海,向日本驻华侵略军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秘密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准备利用上海犹太人在 1942 年犹太历新年(公历 9 月)合家团聚之际,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尔后以果断的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

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犹太人,梅辛格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二是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三是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



日本武装移民在我国东北建立起“开拓村”

营,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由于走漏了风声,上海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海亦姆、斯皮尔曼、托帕斯、比特克、考夫曼和佩立兹等,立即聚会商议对策。他们决定通过各种关系影响日本当局,阻止计划实施。而日本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在日德对犹政策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梅辛格计划”最终无果而终。

虽然“梅辛格计划”没有实施,但日本当局还是于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在上海虹口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让1937年后由欧洲来沪避难至今无国籍者约1.5万人集中居住。这个隔离区与纳粹的集中营有很大的不同,区内的犹太人仍被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区外也没有树立围墙或路障。

到了1944年,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节节败退,日本的战局也出现了逆转,日本高层对犹太人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是作为“河豚鱼计划”翻版的“新计划”孕育而生。

首相顾问关口大佐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指示,秘密会晤一位曾经与魏斯有过接触的居日犹太人卡尔·琼特曼医生,指示他去大连与海军大将中村会面。

中村大将是“新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向琼特曼医生详细介绍了“新计划”。他说,德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对在上海的两万名犹太人采取措施,但是日本在这一点上与德国不同,因为他们“钦佩犹太人的才智”,希望在战后与犹太人合作。中村希望将上海犹太人迁到“满洲”的“犹太国”,保证他们得到良好的生活。作为回报,中村希望美国犹太社团能

够说服罗斯福总统与日本和谈。

琼特曼表示同意。他给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魏斯写信,希望他支持这一计划。魏斯仍然表示反对,他在给琼特曼的回信中说:“看到日本人在其他国家所干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

随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当局又派日高大佐等人找到天津犹太人社团领袖采里·别洛卡曼,希望在华犹太人能够对美国犹太人发表广播讲话,说明日本对其统治下的犹太人是友好的,从而影响罗斯福,迅速而适时地结束战争。但是别洛卡曼认为,在日本战事已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他们发表这种讲话,不会得到日本期待的效果。日高说,倘若我们要求你们发表广播讲话呢?别洛卡曼表示会执行。华北驻屯军当局随后把这一消息报告了东京,却没有得到回复。

日本一些人还是希望能通过犹太人影响罗斯福总统,以期待与美国达成某种基础上的协议,而不是无条件投降。他们为此曾数十次与犹太人接洽,都无果而终。翻版的“河豚鱼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责任编辑:晓虹)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隆重发行

2005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不忘昨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和指导下,由原新四军老战士王祖宏设计,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监制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正式问世。纪念章上方是五星红旗略章一枚;下方是挂件,红、黄两种颜色;图案:边为长城,象征中国军队;中央为中国地图,象征祖国在我心中;两侧为大刀和枪,意为在和平环境下仍应握紧手中枪,时刻做准备。纪念章为24K镀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极具收藏价值,附收藏证书,限量发行5万套,定价60元/套,团购:38元/套,会员、校友优惠价45元/套。外地免邮寄费。现在上海市东安路50弄3号底层有售。



电话:021-64038419 联系人:李鸣
上海青松中老年服务部